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¹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²



摘要: 中国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实现生态的全面启蒙并重塑自身国际形象。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中国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还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此外,中国根据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人类生态目标,坚定不移地致力改善内部生态环境,调整未来工业发展政策。本文主要介绍了导致产生中国生态问题的一些政治历史原因以及中国在生态政策上的根本性转变,即从过去完全忽视生态环境到今天制定了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新思想的十项生态发展目标。文章还特别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生态环保合作和中国在生态技术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最后,作者就中塞在生态科技发展领域合作的可能性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 中国、生态文明、生态政策、 一带 一路、习近平

1 dnadic@gmail.com

2 本文的一部分内容选自作者于2019年10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举办的*The Second USPIR Dean's Forum on Belt and Road and Euro-Asia Connectivity: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会议上宣读的未发表的演讲稿。该会议是由苏长和院长亲自主持的。

中国在建国七十多年里在生态问题上展现了不同的面貌，体现了一种特定的范式。新中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立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走与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目标一致的、自身的发展道路，因此其生态发展道路也较为坎坷。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倡“礼治”和忠孝思想，这对实现中国宏大的发展目标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因为往往有听从国家号召的广大群众自发地参加到建设活动中来。中国始终有三个最重要的发展目标，第一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在明确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下，朝着自己制定的共产主义愿景迈进；第二是走发展经济和生产建设的强国之路；第三是努力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中平等的一员。这三大目标正反映了中国及其在生态政策上所经历的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思想确实对全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但同时也导致了人们与自然的冲突。那些政治运动常常使用军事用语来发动群众，比如“征服大自然”，“发起抢收的总攻”，“挺进开荒大军”，“战胜洪涝干旱”、“消灭四害”等等。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十年里，在诸多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政治社会因素里，有三个重要原因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第一是实施“大跃进”运动，以迅速改造自然，建设共产主义；第二是在具体策略上忽视了各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上的不同差异；第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边疆地区屯垦建设等政策带来的人口流动。这种论断虽然听起来较为笼统，但基本上反映出那个时期的中国在处理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政策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太大不同，即相较于自然规律，更注重运用宣传手段宣扬“人定胜天”的思想。这些思想宣传和动员，

是为了促进经济和工业生产发展，提高社会总体水平，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赶超资本主义”，以显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相较于另一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等不良后果。

中国当时的第二个目标是在国际孤立的情况下实现自给自足，并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并不缺乏自然资源，缺的是现代技术，但现代技术的落后在那个时代是可以通过人力弥补的，于是便发起了征服大自然、加大对自然资源开发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生产运动。或许体现中国发动群众运动征服自然这一指导思想的最好实证就是治理黄河，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战胜自然的极其鼓舞人心的伟大胜利。早在公元前 2000 年，自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禹帝在九年洪水之患后开始建设第一个水利工程以来，治理和开发大河一直是中国处理与自然关系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重任，以为通过全民动员实现这个在执政前就开始拟定的宏伟计划，必将会得到人民的更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在中国所有的河流中，黄河是最容易发生水患的大河。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同时却也因频繁的水患而成为“中国的悲伤”。与人类史上的其他经验一样，这种改变河道、移山倒海似的改造大自然的行为并不是中国人独创的。比如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动用大批（失业）工人建造的加利福尼亚州著名的胡佛水坝，也是使用了部分河流改道等人为改造自然的手段。但不管怎么说，中国至今仍面临着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因工业化而造成的诸多生态问题。中国生态发展的第二、三两个阶段，可以从中国通过发展科技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努力成为世界先进国

家中平等一员的目标来进行考察。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在政治上出现“软化”，在经济上向世界开放，为外国技术和投资打开了国门。当然，这一切变化并不是在一夜之间或自然而然发生的。但这对中国来说，同样意味着将面临一种新的危险，即陷入在新技术上依赖西方的尴尬境地，甚至沦为生态殖民地。事实上，中国可能是在一个最不利的时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因为当时的欧洲，或者说整个西方文明都意识到了一场生态危机的到来，于是试图将即将淘汰的老技术转移到还没有建立生态保护屏障的国家。也就是说，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种生态殖民主义就初现苗头，因为资本的流动不再（仅仅）取决于哪里能更多更快地获得利润，而是首先向那些政治实体没有生态意识的、或者是抵制这种新生态殖民主义的环保法规还不十分健全或根本没有的国家流动。可是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急需一个跳板，不仅实现自己现有技术的现代化更新和改造，而且还想引进甚至改进西方的技术。因此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方面，中国确实取得了在生产和贸易上全球领先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曾一度成了西方文明的巨大的垃圾场，成为全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我们从王久良导演2016年拍摄的纪录片《塑料王国》就足以了解到欧洲和世界的垃圾对中国社会和生态造成的严重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引发了一场生态悲剧。终于，2018年中国采取了禁止向中国境内进口用于回收的危险废物的措施。这项措施可以说明以下三点。首先说明中国生态政治经济意识大大加强了。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于1998年升为部级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被赋予了更大的监督权，同时大大加大了环保机构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行政权力，而在此之前这些规定仅是一纸空文。尽管这个部门当时的执法权力依然十分有限，违法现象普遍存在，

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似已下定决心要扭转“世界污染最严重国家之一”的形象（详见 Shapiro, 2001: 208-210）。

“生态问题已真正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中国领导层不仅意识到污染造成的健康问题和环境净化所产生的巨额开支、为日益加剧的水土流失、水患、沙漠化及沙尘暴所付出的昂贵代价，他们还从各项调研报告中看到，生态环境的退化还将进一步加速疾病率的增加、生产力的下降以及净化成本的提高，无疑这将大大抵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成效。因此，他们极其欢迎成本低廉、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绿色技术。”（Shapiro, 2001: 208）这意味着中国完全放弃了所谓的“危险资源”以及对这一产业经济的依赖，同时还对世界其他国家释放出一个政治信号：现在得自己想办法进行对生态有严重影响的垃圾回收处理了。中国对世界关闭垃圾进口市场之举产生的第一波影响，便是国际垃圾回收政策一度出现了轻度危机，尤其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中国迈出的这第一步（中国生态政治的觉悟和成熟），我且借用1958年“大跃进”的提法，称之为“生态大跃进”，它始于 2018 年的禁止垃圾进口，但这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生态保护措施，也不是唯一出现的重大生态转变。

一年后，2019 年的中国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倡导下，不仅希望在工业、经济、贸易、军事和政治上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还希望在生态领域跟上时代的步伐。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十大生态政策，

更确切地说也是改善中国现有生态环境的十大目标。³ 第一是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的奖励政策,中央财政奖补促“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厕所粪污基本得到处理和资源化利用。⁴第二,推进国家环保机构的严格督察执法,将环保问题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⁵三是生态环境部公布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名单,其中包括深圳、包头、铜陵、威海等城市。四是交通运输部、国家改革发展委员会、生态环境部等十二个部门推出《绿色出行行动计划(2019—2022年)》。⁶五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核安全白皮书》。⁷六是生态环境部召开全国扶贫日生态环保扶贫论坛,让生态环境保护贯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全过程,用脱贫攻坚的成效夯实乡村振兴的绿色本底和可持续发展根基。七是以水资源保护为目的,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两部委联合印发《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法》。八是发布《生态治理蓝皮书:中国生态治理发展报告(2019-2020)》。⁸九是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

3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 (访问日期: 2021.5.15).

4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 (访问日期: 2021.5.15).

5 见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4月21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所做的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环境状况 and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6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 (访问日期: 2021.5.15)

7 “白皮书指出,原子的发现和核能的开发利用,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极大增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核能发展也伴生着安全风险和挑战。人类要更好利用核能、实现更大发展,必须应对好各种核安全挑战,维护好核安全。”摘自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 (访问日期: 2021.5.15).

8 报告指出,中国生态治理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实现全面遏制土地退化目标的长期性;二是破解生态保护优先发展与产业化进程冲突的紧迫性;三是自然保护地共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果的艰巨性;四是提升监测能力和构建现代监测体系的基础性。摘自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这一政治目标在 2021 年 4 月 22 日（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召开的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得以实现。习近平在峰会上的讲话展现出中国生态政策质的突破，打破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关于社会和自然关系的传统观念。习近平在讲话中说：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⁹

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还突破了中国以往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框架，他说：

——坚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我们要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法。要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方向，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以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¹⁰

这些讲话内容是中国生态启蒙思想的核心所在。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向其他世界领导人传达的信息中还提到了三个重要原则，其中生态政治问题便是重中之重。第一个原则便是要“坚持系统治理”的思想；¹¹第二得出“生活品质”的新理念，即除了消除贫

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访问日期：2021.5.20）

9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访问日期：2021.5.23）

10 同上。

11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要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摘自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访问日期：2021.5.20）

困、发展经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还应包括环境保护；¹²第三项原则阐明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时的政治立场，这也涉及到中国在决定整个世界命运的未来政治对话中所持的原则。概括起来，这就是坚持多边主义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习近平指出，我们都有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但发达国家有义务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帮助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工业发展水平及能力对世界气候的影响并不像发达国家那么大。这样，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惯例站在了被边缘化的、不受保护的发展中国家的一边。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还提出了中国的生态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最后，中国第十大生态环境政策，即中国改善生态环境的第十个目标是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9月，“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博鳌亚洲论坛在京联合发布《“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赵英民出席发布会并致辞。《“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是联盟2019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有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绿色发展的首份重要研究报告，也是博鳌亚洲论坛首次就绿色发展议题发布专题报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从污染治理、生态系统管理和保护、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金融等绿色发展的六个方面，以富有成效、获得认可、可

12 “坚持以人为本。生态环境关系各国人民的福祉，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良环境的期待、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摘自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访问时间：2021.5.20）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推广复制的原则，选择不同地域、10个国家、不同行业的13个绿色发展案例进行分享。”¹³

从生态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至今仍颇受质疑，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为这项工程的性质作补充说明和解释。这里我们试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某些局限性，准确地说，从世界上，包括政治经济高层和一些学术圈子对这个倡议的看法谈起。

我们从媒体上经常听到的、甚至在一些学术圈子里比较流行一种说法就是，“一带一路”是新中国霸权主义的表现，是中国想通过经济手段，特别是通过投资，实现和扩大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影响和控制。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是出于一种偏见。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经过各个参与国家公开讨论，交换意见和想法，最后经过修改补充后才正式提出的计划，这是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独特的全球公开讨论机制。我们不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球化”计划在实施之初是否也走过这样民主讨论和专家评审的程序，只知道“全球化”在推行后出现了负面影响，才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我们还知道，二十世纪推行的这种“单向全球化”进程最终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术语来说这叫“气候变化”。与之相反，“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双向全球化”，而且是生态上可接受的“双向全球化”，就这一点我们稍后再加详述。我们认为这其实才是对“一带一路”产生偏见的症结所在。不少人仍然把中国视为经济和生态殖民的沃土，不愿接受中国在技术，特别是生态技术创新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西方文明的事实。建立在扩

13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 (访问时间：2021.5.20)

张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是极为自私的，今天它的自私性只是更加隐蔽，有时候还带有政治伪装，但从其本质或从产生的后果上看，完全没有任何改变。西方经常对人颐指气使，带着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口吻，实际上只不过是虚伪的优越感作怪。第一次“全球化”（单向的）不论从经济上还是生态上看都是失败的，是对世界的经济和生态的殖民化。

所以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双向全球化”的实证，也正因为这点它不被保守派接受。在此我们并不想使读者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是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在讲话，我们仅引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个言论来充分说明美国对当代中国的态度。一次是特朗普发推文说：“全球变暖是中国人制造的骗局，旨在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但另一回他却说：“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空气和水质污染较严重，清洁方面都不是很好。他们一点都不管。”

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偏见的第二个原因仍根植于西方文明本身的特点，即与西方的自恋情结有关。他们的宣传机器为“西方产品”制造舆论，批评中国商品廉价劣质，使用寿命短。只不过这里已涉及到“双向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战了。造成偏见的第三个原因则是不实信息，诸如，大多数由中国资助的在中国境外建造的燃煤热电厂使用的都是低效率的亚临界燃煤机组，是各种类型发电厂中排放量最高的。散布这种谣言无非是想传递一种信息：中国不仅破坏了自己的生态环境，还会破坏投资地的生态环境，所以“新丝绸之路”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净化”中国，污染世界。

说实话，这种言论完全是出于典型的报复性思维，报复今天的中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国拒绝成为欧美的垃圾场。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抛开“经济战”不谈，我们换个角度看，中国已给出承诺碳排放量将在 2030 年达到峰值，随后将迅速下降，同时中国在《巴黎协定》谈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中国正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C 以下努力的引领者。此外，中国还积极投资太阳能、风能、水电和电动汽车项目，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中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定义为“生态文明”，笔者不曾见过世界上还有哪位领导人这样提过，说希望本民族的文明成为“生态文明”。习近平还强调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丝绸之路。显然，习近平主席没有重复“单向全球化”的论调，也没有使用诸如“资本、人员、货物、思想、信息等自由流动”等经济殖民主义的词汇，而是提倡“双向全球化”的理念，其关键词是“绿色、健康、和平”，正如他在 2017 年 5 月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指出的那样：“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是从 2007 年开始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形态中的。之后自 2007 年至 2017 年，中国有 4000 多篇发表的文章和论著将“生态文明”一词作为关键词之一（Cuhn, 2019）。生态文明的理念认为自然与人是一种共生关系，大自然不能无限制无止尽地开发的，这种理念作为中国领导层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生态观的基本框架，¹⁴ 能够协调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Cuhn, 2019）。这一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也被列入上文

14 从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到安德烈·戈茨（Andre Gorz）再到大卫·佩珀（David Pepper），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了解当代社会主义的生态观可参见：纳迪奇，2012。

所述的中国十大生态政策(目标)中,但这是否标志着中国从“自由环保主义”向“权威环保主义”过渡,有待于从政治和生态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Wang-Kaeding, 2018)。

以上我们陈述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偏见和支持的声音。那么真相到底在哪里? 我们知道,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生产领域是世界领先国家,发电量比排名第二的美国高出两倍多。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728 吉瓦,其中主要是水电和风电。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化石燃料发电及核电产能。中国是世界风能的生产大国,新风电场建设持续快速增长,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中国幅员辽阔,海岸线长,拥有得天独厚的风能资源,据估计,中国陆地拥有2,380 吉瓦的可开发容量,同时海洋有200 吉瓦的可开发容量。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和太阳能热能市场。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光伏(PV)安装国; 2015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生产国之一,仅次于德国; 2017年 中国是第一个累计光伏装机容量超过 100 吉瓦 的国家; 2018 年底,中国累计的太阳能装机容量达到 174 吉瓦。截至 2018 年 5 月,中国在腾格尔沙漠建设的最大的太阳能运营项目保持着 1,547 兆瓦的记录。中国还在交通工具,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保持领先,2015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超过了美国; 2018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超过110万辆,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55%以上,并且比两年前的国内销售量增加了三倍,而同年美国电动汽车的销量仅为35.8万辆。中国政府意识到电动汽车可以帮助和带动解决一些最紧迫的能源和生态问题,比如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的问题,其次,中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国迄今仍是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大排放量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罪魁。

我2019年在上海的亲身经历也打破了本人对中国生态的一些偏见。虽然上海是中国的“示范”城市，但它可能并不是展示中国生态转型的最好典范，不过这个城市的一些方面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不仅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高耸入云的商务住宅大楼，它还是一座绿意盎然的城市，有着整治和养护得很好的公园。虽然上海的城市交通十分拥挤，但它的空气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对上海的这种观感着实让复旦大学的中国同事感到惊讶和高兴。我特别注意到上海实行对传统污染车辆、新型电动及混合动力车辆、公共汽车颁发不同牌照加以区分的交通管理制度。电动车辆持绿色牌照，象征性地区别于其他交通车辆，而政府还为购买电动汽车者提供税收及其他财政减免等政策优惠。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在我下榻的酒店房间里放着一块通告牌，上面写着：“为了贯彻国家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的政策并响应党的号召，本店不提供鞋油和鞋刷。”因为提供鞋油和鞋刷既不经济也不环保。中国在这场生态转型主要依托的力量是青年。尽管青年是以消费为导向的，但正式和非正式的生态教育体系都积极引导儿童和青年，尤其是学生群体，不仅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生态问题，而且还要在某些领域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掌握更多的资讯。

结语：塞尔维亚和中国

中国确确实实在努力改变自己在国内国际上的生态形象。虽然至

今仍存在着因过去长期在政策上不重视生态问题而遗留下来的问题，且还需花很长时间才能克服解决，但中国领导层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政治和生态目标，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生态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即使不能成为世界上的领先国家，但至少也是国内外一个负责任的榜样。许多人对中国新生态政策的诚意还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认为不应该怀疑中国现代国家的特点，即中国为实现某种理想是一个重承诺且努力践行的政府，这是有目共睹的。当前中国更多地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彻底取代了毛泽东“人定胜天”的口号，其对生态环境的态度从中可见一斑。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塞尔维亚在生态技术上不论是同西方还是同中国相比，都大为滞后。也就是说，塞尔维亚因缺乏对上文提到的“绿色”和“健康”这两个关键概念重要性的认识，生态创新发展的进程已经放缓。目前，塞尔维亚处于一种特殊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我们有加入欧盟的政治愿望，这意味着全盘接受欧盟的生态标准，当然还包括来自欧盟国家的技术，而这些欧盟国家都是在“单向全球化”进程中走在前列的国家。而另一方面，塞尔维亚环境保护部今年的预算在增加40亿第纳尔的基础上，一共才123亿第纳尔。虽然与过去相比这个环保预算已高出许多，但要消除因长期忽视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后果以求与欧盟保持一致，这是远远不够的，也说是说，我们可用于生态转型的资金极为有限。塞尔维亚与中国有相似的经历，这就是我们都背负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生态问题，这意味着需要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中塞之间有着“钢铁友谊”和政治上充分的相互理解，鉴于塞尔维亚在生态现代化方面的生态利益，塞中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不应就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仅以投资铁路、收购钢厂和火力发电厂现代化改造作为起点和终点。这一轮中国投资给塞尔维亚带来的真正的风险是，个别中国公司，特别是“有害”的重金属加工业不按环保要求进行生产活动，还常常规避我们的环保法规。这已引起塞尔维亚公众舆论的极大不满，因为我们把中国看成自己的朋友，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中国企业能尊重并执行塞尔维亚的环保法和生态标准。当然，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应当面对现实，即资本和利润不管是绿色、红色还是黑色的，其本质都是不惜任何代价追求自身的积累和增加。

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下，塞尔维亚今后应在生态领域引进中国投资，即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可实际上，贝尔格莱德街头除了中国制造的手机（价廉物美，而且使用寿命也长），随处可见的还有“中国制造”的小米电动滑板车，只是这些电动滑板车也是需要能源的。于是，我们又回到没有政治冲突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气候变化的话题上，因为我们开发什么类型的能源以及我们留下什么质量的空气，这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金晓蕾 译）

参考书目：

Cuhn, B. (2019).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China*, DOC Research Institute, 2019. Available at:<https://doc-research.org/2019/08/ecological-civilisation-china-berthold/> (viewed: 23.5.2021).[In English]

Marković D.Ž. (2004). *Social Ecology*, Beograd.[In Serbian]

Nadić, D. (2012). *Essays on Political Ecology*, Beograd.[In Serbian]

Shapiro, J. (2001). *Mao's War Against the Natur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In English]

Wang-Kaeding, H. (2018), *What Does Xi Jinping's New Phra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ea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hrase is pressing*. Available at: <https://thediomat.com/2018/03/what-does-xi-jinpings-new-phrase-ecological-civilization-mean/> (viewed: 28.5.2021).[In English]

参考网站: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

<http://www.xinhuanet.com>

<https://english.mee.gov.cn/>

Darko P. Nadić
University of Belgrad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s
Belgrade (Serbia)

Summary

China's Ecological Path

For almost two decad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on the path of complete environmental enlightenment and redesign of its charact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 is becoming not only an active but also a dominant participant in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In addition, China is firmly determined to change its internal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and its policy of further industrial progress, harmonizing it with the generally accepted environmental goals of humanity. The paper presents the basic facts about certa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auses of inadequate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attitude towards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radical ec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viation from ignoring ecological problems to formulating ten new goals, ie ten ecological policie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new ideolo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special review in the paper is given to the ecological ele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revious Chinese achievements in ec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 also suggests a direction for possibl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erbia in the field of that ecological-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vironment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i Jinping*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国风电场